

## 昆仑名师论坛

# 跨越东西方的诗歌之旅

## ——从《鲁拜集》的最初汉译看文学翻译成功的时代契机

王一丹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鲁拜集》是十一、二世纪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代表作,因十八世纪英国学者菲兹杰拉德的英译而蜚声世界,五四时期又经胡适、郭沫若等人的译介而传入中国,广受欢迎。90多年来,《鲁拜集》的汉译层出不穷,它所引发的关于诗歌翻译的讨论经久不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独特现象。文章以胡适、郭沫若两人对《鲁拜集》的最初翻译为切入点,讨论他们的翻译获得成功的时代因素,指出只有符合时代需求、契合时代精神的翻译作品才有生命力,能够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和共鸣。

**关键词:** 鲁拜集; 波斯诗歌; 汉译; 海亚姆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245(2012)06-0001-07

### 一、从胡适的一首译诗说起

1919年4月15日发行的《新青年》第6卷第4号,刊发了胡适(1891-1962年)翻译的一首波斯四行诗。该诗转译自19世纪英国诗人、翻译家费兹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 1809-1883年)的英译本《鲁拜集》(Rubaiyat),即著名波斯古典诗人海亚姆(Omar Khayyam, 1048-1123年)的四行诗集。《鲁拜集》中各诗原本没有标题,胡适翻译此诗后,题名为《希望》,并写了题记。此诗后来收入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3月出版的《尝试集》,但题记被删,汉译后所附的菲兹杰拉德的英文翻译也有所改动。胡适翻译这首《希望》让中国读者首次接触到海亚姆及其作品。译诗的题记简短而明了,准确地介绍了海亚姆的成就以及“鲁拜”(rubā'ī)<sup>①</sup>这种波斯传统诗歌的主要特点。下面是《希望》一诗及其题记:

### 希望 胡适译

这首小诗的原著者Omar Khayyam乃是波斯国人。他的数理和天文学是波斯文明史上的一种光荣。他不但是一个科学家,还是一个诗人。他有五百首“绝句”(原名Rubaiyat,乃是四句体的诗,一、二、四句押韵,第三句没有韵,很(很)像中国的绝句体,故借用此名)很(很)有名的。英国诗人Fitzgerald译出了一百多首,此外还有他种译本。这一首是Fitzgerald译的第108首。

这位波斯诗人生年已不可考,他死在西历1123年,当中国宋徽宗宣和五年。

要是天公换了卿和我,  
该把这糊涂世界一齐都打破,  
再团再炼再调和,  
好依着你我的安排,把世界重新造过!  
Ah! Love, could you and I with Him conspire,

收稿日期:2012-09-03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重大项目“波斯古典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2009JD750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一丹,北京大学波斯语教授,博士。

To grasp this Sorry Scheme of Things entire,  
Would not we shatter it to bits- and then  
Remould it nearer to the Heart's Desire!  
Omar Khayyam<sup>②</sup>

诗中洋溢着一种打破束缚、大胆解放和创造的激情与勇气。胡适翻译这首“希望”之时,正值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特征的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其时的胡适,作为白话诗最早的积极倡导者,扛着“文学革命”的大旗,正大力主张并亲身实践着白话诗的创作。他出版于1920年的《尝试集》是中国第一部新诗集。在《〈尝试集〉自序》中,胡适提出了“诗体大解放”的主张,要“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sup>③</sup>这种打破旧秩序、开创新天地的精神在新诗创立期影响极大,这也正是《希望》这首译诗的精神。

菲兹杰拉德翻译的《鲁拜集》,内容大多是对韶光易逝、人生无常的慨叹,其基调是“清新的东方情调和一种但求今世欢乐的思想”<sup>④</sup>,弥漫着“淡淡的忧郁和浪漫的风格”<sup>⑤</sup>,表达了“醇酒妇人的享乐主义”和“‘宇宙为万物之逆旅,人生乃百代之过客’那种永恒的悲哀”,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迷惘怀疑”情绪<sup>⑥</sup>。只有被胡适选中的这一首,洋溢着一种特别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充满了一种打破旧世界、开创新天地的豪迈。

在这里,我们不妨再抄引一首胡适填写的《沁园春·誓诗》,与《希望》两相比较:“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拳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sup>⑦</sup>

好一个“制天而用之”,“簇新世界,供我驱驰”!如此气魄非凡的气概,与《希望》一诗何其相似。如果说两者有区别的话,正如它们各自的题名那样,《誓诗》表达的是一种誓言,为“文学革命”摇旗呐喊的决心与誓言;《希望》则表达了一种愿望,打破传统、开天辟地的愿望。《誓诗》作于1916年,《希望》译于1919年,同属于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反映的同是一种激扬反抗、自由创造的时代精神。

胡适翻译的这首《希望》,据说是他“最得意的一首译诗,也是在他诗里最脍炙人口的一首”。<sup>⑧</sup>这首诗在当时产生了不小反响,不少诗人、评论家都曾发

表看法,褒贬得失,并就诗歌翻译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闻一多(1899-1946年)说:“胡译虽过于自由,毫未依傍原文,然而精神尚在。”<sup>⑨</sup>成仿吾(1897-1984年)则说:“一多说胡适之的《希望》精神尚在,我却不以为然。胡译不仅与原文相左,而且把莪默的一贯的情调,用‘炸弹!炸弹!炸弹!干!干!干!’一派的口气,炸得粉碎了。”<sup>⑩</sup>徐志摩也认为胡适的这首诗“不能叫译”,他说:“适之那首莪默,未始不可上口,但那是胡适,不是莪默。”<sup>⑪</sup>显然,胡适的汉译,也像菲兹杰拉德的英译本一样,被认为不忠于原作;同时,它也像菲兹杰拉德的英译本一样,传达着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信息,因而激起了时人的共鸣。正如当时一位读者所说:“我们中国现在的青年,哪个读了能不受感动?”<sup>⑫</sup>

菲兹杰拉德的英译本《鲁拜集》第二版有110首四行诗<sup>⑬</sup>,胡适唯独选译了这一首,并非偶然。在1928年9月10日发行的《新月》第1卷第7号上,我们读到了胡适翻译的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戒酒》,小说结尾处引用了欧玛尔·海亚姆的两首四行诗,其中最后一首即这首《希望》,不过没有标题,译文有两处不同,一是诗句以5行的形式出现,二是第2行的“糊涂世界”改作“糟糕世界”。据胡适的附记,此篇小说译自“美国短篇小说大家博德(William Sydney Porter),笔名‘哦(欧)亨利’(O. Henry)……他短篇全集凡十二册,此篇原名为The Rubaiyat of a Scotch Highball,载在全集中的The Trimmed Lamp一册内。哦(欧)亨利最爱用一地的土话和一时的习语。土话是跟着地方变的,习语是跟着时代变的,时变境迁,便难懂得。字典又多不载这种土话熟语。故外国人读他的作品往往感觉很大的困难。我译此篇的志愿,起于1919年2月,只译了其中的莪默的第二首诗,后收在《尝试集》中,题为希望。一搁笔便直到今日,十年的心愿于今方了,总算一件快心的事。”<sup>⑭</sup>如此看来,胡适译此诗的起因,是欧亨利的小说,诗歌很快译出,小说本身却迟至9年后才译成,这固然是因为小说难懂——如胡适所言,但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这首诗更强烈地打动了译者的心。小说中引用的另一首鲁拜,就没有得到胡适同样的喜爱,因为它是一首劝人珍惜青春、及时畅饮的酒诗,虽然优美,却不符合译者当时的精神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翻译的《希望》一诗,并不只以上两种版本,另外还有第三种未曾刊发、鲜为人知的译文。2012年5月5-9日,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的“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14周年北大著名学者手稿展”

上,展出了胡适的5件手稿,<sup>⑤</sup>其中一件为“胡适译古波斯诗人莪默《鲁拜集》诗一首”,译文如下:

爱呵!要是天公能让你和我  
抓住了这糟糕的世界,  
我们可不要把他全打破,  
好依着我们的心愿重新造过么?

这个译稿与发表于《新青年》和《新月》上的两种译文区别较大,尤其是第一行的起始句“爱呵!”在胡适已发表的版本中是没有的,第三行的翻译,也改掉了“再团再炼再调和”那种旧体诗的味道,<sup>⑥</sup>而采用了更舒缓的、接近口语的白话。在手稿上还清晰可辨译者所做的修改,其中,原写作“寒伧了”的三字被删去,改作“糟糕”;“全打破”前原本有“一齐都”三字,后被圈划删除;最后一行所做的改动最大,原译是“再依着我们称心如意地把他重新改造过么?”译者删减掉了过多的赘词。从胡适对手稿的修改可以看出,他对这首诗的翻译相当慎重认真,经过了反复推敲,一译再译。由于手稿未注明完成日期,无法得知它与已发表的两译稿孰前孰后。

比较三种译文,未出版的这一稿从“忠实性”角度来看似更接近菲兹杰拉德的英译,但诗歌内在的节奏感却不如《新青年》版,尤其是在用韵上,《新青年》版“我、破、和、过”四个韵脚连用,自然而有力,一气呵成,比第三种译稿更富于感染力。

《希望》一诗虽短,却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它以清新自然的白话,激情洋溢的风格,引起当时文坛的注目,在此之后,才出现了郭沫若的全译本《鲁拜集》,从而进一步吸引了时人的关注,并引发了现代文学史上一次关于诗歌翻译的热烈讨论。这次讨论不仅扩大了海亚姆及《鲁拜集》的影响,也推动了汉语诗歌翻译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首小诗开风气之先,功不可没。

## 二、郭沫若与《鲁拜集》全译本

在胡适首开纪录、翻译了《希望》这首四行诗以后,郭沫若(1892-1978年)于1922年9月完成了对菲兹杰拉德英译本第4版全部101首鲁拜的汉译,并撰写了一篇长文《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加以介绍,文章与翻译一并刊发于1923年的《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三期<sup>⑦</sup>。其中第99首与胡适的《希望》为同一首。在文章的第一节“读Rubaiyat后之感想”中,郭沫若说《鲁拜集》使他联想到了屈原的《天问》对宇宙人生的疑

问,联想到了歌德的《浮士德》和我国的“古诗十九首”中的享乐主义,并认为从海亚姆的诗歌中可以看出我国诗人刘伶和李太白的面孔来<sup>⑧</sup>。

郭沫若的翻译引起了更多人对海亚姆的兴趣。闻一多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1号(1923年5月)上发表了评论文章《莪默伽亚谟之绝句》,表示“我读到郭译的莪默,如闻空谷之跫音”<sup>⑨</sup>,认为郭译的成功之处在于“译者把捉住了它的精神,很得法地淘汰了一些赘累的词,而出之以十分醒豁的文字,铿锵的音乐。”<sup>⑩</sup>对于郭译各诗中的失误,他逐一举例指出并订正,还同时刊出了他自己的几首翻译。此后不久(1924年11月7日),诗人徐志摩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短文《莪默的一首诗》,针对胡适翻译的《希望》提出看法,并根据自己的理解作了重译,与胡适的译文一起刊出,以期抛砖引玉,“供给爱译诗的朋友们一点子消遣;如其这砖抛了出去,竟能引出真的玉来,那就更有兴致。”<sup>⑪</sup>徐志摩的这篇文章及译诗,吸引了一个名为“天心”的读者的注意,他在几天后的《晨报副刊》上发表《我也来凑个趣儿》一文,附上自己的译诗,并写道:“我因看见胡适之、郭沫若、徐志摩关于莪默的一首小诗闹得如此有趣,所以也忍不住要来凑个趣儿。怪不得适之先要用寸楷来写,高声用徽州调来唱这首诗的,它本来是很好呢,尤其是我们中国现在的青年,哪个读了能不受感动?”<sup>⑫</sup>此文刊发的第二天,一位“荷东”读者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议论,认为胡适是意译,徐志摩是直译,都有可改进之处,因此他分别用白话与文言两种风格尝试进行翻译,“以凭胡徐二先生鉴定。”<sup>⑬</sup>

这一连串的反响,不只令人感到“如此有趣”,还令今人看到了当时文坛的活泼健康、开放自由的批评氛围。鉴于这几人的译作是继胡适《希望》之后最早的鲁拜汉译,今天的读者已不易见其全貌,我们在此将其逐一转录。至于这些译文——以及后来的各种《鲁拜集》汉译——孰优孰劣,非本文主旨所在,这里不作比较,读者见仁见智,可以有不同看法。

郭沫若:

啊,爱哟!我与你如能反畔“他”时,  
把这不幸的全部的“计划书”来夺取,  
我怕不把它扯成粉碎——  
从新又照我心愿涂写!<sup>⑭</sup>

闻一多:

爱哟!你我若能和“他”钩通好了,  
将这全体不幸的世界攫到,

我们怕不要搞得他碎片纷纷,  
好依着你我的心愿去再转再造!<sup>⑤</sup>

徐志摩:

爱阿!假如你我能够勾着运神谋反,  
一把抓住了这整个儿寒尘的世界,  
我们还不趁机会把他完全捣烂,——  
再来按我们心愿,改造他一个痛快。<sup>⑥</sup>

天心:

爱呵!你我若能与上帝勾通,  
把这个糊涂世界整个抓在掌中,  
我们怕不一拳捶它粉碎,  
依着你我的心怀,再造成整块?<sup>⑦</sup>

荷东:

白话体:

爱呵!你我果能与运神合商(或叶韵改合作)来  
执掌这支配万物的权,

我们岂不能将世界都打碎(或叶韵改打破)改造  
成合我们心意的一种变迁?

文言体:

噫气长吁叹  
爱神汝来前;  
果能参造化,  
执此万类权,  
摧枯如碎粉  
新观逐物迁,  
一一随意旨  
诤不心豁然?<sup>⑧</sup>

以上的翻译,有白话体,也有文言律体,不见得都  
很理想,但是几位诗人和读者的热情参与、尝试、互相  
切磋与讨论,却为后来翻译的进步提供了宝贵经验<sup>⑨</sup>。

这里还应一提的是闻一多对郭译的批评,以及  
郭沫若的回应。闻一多对郭译《鲁拜集》评价很高,  
但是对于他的失误,批评起来也毫不客气,认为他的  
翻译有时是“明珠艳卉”,有时却是“马勃牛溲”,有时  
忠实到笨拙的地步,有时却又“自我作古”,“英雄欺  
人”,“全篇还有一个通病,便是文言白话硬凑在一  
块,然而终究油是油,水是水总混合不拢”<sup>⑩</sup>。面对这  
些批评,郭沫若未作任何辩驳,而是全盘接受,并表  
示:“我一面校对,一面对于你的感谢之念便油然而  
生。你所指摘的错误,处处都是我的弱点,我自己也  
是不十分相信的地方,有些地方更完全是我错了。  
你说Fitzgerald的英译前后修改了四遍,望我至少当  
有再译三译。你这恩笃的劝诱我是十分尊重的。我  
于改译时务要遵循你的意见加以改正。”<sup>⑪</sup>回顾这一

段往事,令人由衷地感到欣慰,为被批评者的虚怀若  
谷,也为批评者的直言无忌,同时,也令人更深怀念  
那个造就了如此文坛佳话的、已经远去了的时代。

在此后出版的《鲁拜集》单行本中,这首译诗经  
过了修改,形成了今天通常所见的这个译文:

啊,爱哟!我与你如能串通“他”时,  
把这不幸的“物汇规模”和盘攫取,  
怕你我不会把它捣成粉碎——  
我们从新又照着心愿转拟!<sup>⑫</sup>

在这个译文中,译者不仅遵从闻一多等人的意  
见改正了第一行中的失误,把“反畔”改为“串通”,同  
时对后三行也做了不小改动。只是,修改后的译文  
中“物汇规模”一词晦涩难懂,破坏了全诗语言的清  
澈和流畅,与郭译其他各诗相比,实非上乘之作。

郭沫若翻译的这101首诗,于1924年1月由上海  
泰东图书局出版单行本,书名《鲁拜集》。《鲁拜集》  
与郭沫若创作的诗集《女神》(1921年)一样,都是“五  
四”精神所激发的产物。郭沫若本人谈到当年惠特  
曼《草叶集》对他的影响,“正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  
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  
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sup>⑬</sup>“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  
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暴飙突进的  
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  
朗的调子所动荡了。”<sup>⑭</sup>这里说的是郭沫若诗歌创作  
的缘由,也同样适用于他翻译《鲁拜集》时的情况。  
郭沫若在五四时期以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诗  
歌,不论是创作还是译作,大都回荡着高昂的激情和  
雄壮的旋律,反映了一种突破一切束缚的彻底叛逆  
精神和热望新生的浪漫主义激情。在稍后发表的  
《黄河与扬子江的对话》中,作者继续呼唤着“二十  
世纪的中华民族大革命”,号召“把一切的陈根旧蒂和  
盘推翻,另外在人类史上吐放一片新光”<sup>⑮</sup>,与上引  
鲁拜译诗中“和盘攫取、捣成粉碎”非常接近。《对话》  
最后的短诗中,第一句就是:“人们哟!醒!醒!醒!”  
使人很自然联想到郭译《鲁拜集》第一首第一句:“醒  
呀!太阳驱散了群星……”<sup>⑯</sup>两者风格颇为相似。  
在这篇作品中,作者充满了对革命未来的憧憬,其中  
洋溢着的高亢的反抗和破坏的激情,与译自海亚姆  
的那首诗也是相通的。

### 三、《鲁拜集》初期汉译成功的启示

郭沫若翻译的《鲁拜集》“在之后的20多年里一  
共出版了4种版本,至少重印了8次以上,对中国新诗

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sup>②</sup>事实上,郭译《鲁拜集》出版后,很快就有更多人加入到《鲁拜集》翻译队伍中来,据新近出版的一本研究专著所列的《鲁拜集》主要译本简表,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在郭沫若之后翻译出版过《鲁拜集》的译者有10人,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台湾出版的《鲁拜集》译本有8种之多,内地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不断涌现新译本,除了转译自英语的译本以外,还有了直接译自波斯语的三种译本<sup>③</sup>。这个简表并不完全,至少还可增加两种最近译自英语的译本<sup>④</sup>,以及另外两种直接译自波斯语的译本,其中一种为英-法-汉-阿拉伯-波斯5语对照版<sup>⑤</sup>,另一种为英-法-俄-阿-西(班牙)-汉-日-波斯8语对照版,均出版于德黑兰<sup>⑥</sup>。

《鲁拜集》汉译者中,有大名鼎鼎的诗人<sup>⑦</sup>,有著作等身的文学家,也有笔耕多年的翻译家,以及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可谓“译笔缤纷,华章比美”<sup>⑧</sup>,蔚为大观。甚至在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作家金庸也借故事中波斯少女之口,吟咏海亚姆的诗句:“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sup>⑨</sup>译笔之典雅飘逸,令人称绝。

伴随着译本出现的,是不断增多的有关翻译问题的讨论。对于《鲁拜集》汉译的历史与得失,已有众多研究者进行了回顾与总结<sup>⑩</sup>。在总结的基础上,又逐渐产生了对《鲁拜集》汉译方法的理论探索,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应是黄杲炘根据其多年翻译实践经验总结出的“兼顾译诗行顿数、字数与韵式”的翻译法<sup>⑪</sup>,以及邵斌在系统考察各家《鲁拜集》汉译方法的基础上,提出的“诗歌创意翻译”概念<sup>⑫</sup>。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自二十世纪末开始,在《鲁拜集》翻译研究领域,逐渐有研究者立足于波斯语文本和波斯-伊斯兰文化传统,重新审视《鲁拜集》的翻译,起初是张承志、张鸿年等知名学者提出质疑<sup>⑬</sup>,后来又有研究者更进一步,尝试采用后殖民理论来观照《鲁拜集》的汉译,她们或分析中国译者在西方视角影响下长期以来对海亚姆形成的误读<sup>⑭</sup>,或探讨《鲁拜集》如何经菲兹杰拉德英译本的折射,被附加上英语文学所处的强势地位,从而影响了当时中国对波斯文学认知的过程<sup>⑮</sup>。这一类文章目前为数不多,但代表着一种新的研究趋势。

就诗歌本身而言,海亚姆用波斯语创作的《鲁拜集》语言纯净,风格清新,哲理深邃,几乎每一首都堪称波斯语诗歌的精品,令所有懂波斯语的人沉醉。因此,尽管译自英语的《鲁拜集》已如此之多,也不乏成功之作,却仍然不断会有懂得波斯语这门诗歌语

言的人愿意倾尽全力将它直接从原文译出,为人们提供更多认识的角度和鉴赏的途径。与《鲁拜集》英-汉翻译90多年的历史相比,直接译自波斯语原文的《鲁拜集》汉译时日尚短,经验不足,更未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还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难题,而《鲁拜集》英-汉翻译长期积累的经验正如一笔巨大的财富,如果后来的译者善于从中借鉴经验,汲取营养,那么假以时日,译自波斯语的《鲁拜集》,也同样可以产生令人传诵的佳作。

《鲁拜集》可以说是译成汉语次数最多、最受中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波斯文学作品。如果说,胡适当初翻译的那首《希望》,像一颗蒲公英的种子,跨越了千山万水,从西方来到东方,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那么,随着《鲁拜集》各种汉译本问世,这颗种子已经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开出了众多缤纷的花朵。回顾这颗种子落地和成长的过程,以及催生它生长的气候和土壤,我们仍能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和感悟。

中国与波斯虽然同处世界的东方,但《鲁拜集》这部波斯文学的名著,却是首先通过远在西欧的英国翻译家、作为英语文学的名著而被介绍到中国,获得人们的喜爱和欣赏。从波斯到英国、再从英国到中国,在辗转跋涉于异文化国度的过程中,《鲁拜集》给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民族,带来了不同的情感慰藉和精神力量。《鲁拜集》翻译过程中这种因时代和民族而异所发生的再创造现象,反映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翻译者对它的文化内涵的取舍。

比较英语文本与波斯语文本《鲁拜集》的区别,以及它们各自的汉译本的不同,将使我们真正理解《鲁拜集》在波斯、英国和中国跨文化语境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变异、过滤、误读、重写等现象,其有趣之处远远超越了一般的语言翻译的层面和单纯的文学接受的范畴,体现了更为复杂的文化碰撞和文化对话的问题。

#### 四、结语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特点和精神需求。正如文学创作要顺应时代精神一样,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再创作,也受制于时代的精神与需要。只有符合时代需求、契合时代精神的翻译作品,才能引起共鸣、打动心灵,才能被翻译作品的读者所广泛接受。如果没有菲兹杰拉德那充满维多利亚时代人文精神的、自由而优美的、富于创造性的翻译,海亚姆作为

诗人的面目也许至今仍不为世人所知,《鲁拜集》仍然只能作为一部深奥的波斯古典文学文本停留在少数几个东方学家的案头,而不会像今天这样走入世界上无以计数的读者的心田,引起如此广泛的共鸣。同样,如果没有胡适和郭沫若那反映了五四精神的汉译《鲁拜集》不会在当时的中国读者之间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也不会在此后的中国文学史和翻译史上留下如此悠长的回响。事实上,如同菲兹杰拉德的《鲁拜集》英译本已经成为英国文学经典的一部分一样,郭沫若的《鲁拜集》汉译本也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分。如果说好的诗歌翻译要“特别能培养一种新的感受力,特别能给另一种语言和文化注入新的活力”<sup>⑤</sup>,从这一点来说,菲兹杰拉德做到了,胡适和郭沫若也做到了。

#### 注释:

- ① 胡适称之为“绝句”,另有“柔巴依”、“怒湃”、“四行诗”等多种译名,本文按多数人习惯,称之为鲁拜。
- ② 原载《新青年》1919年4月15日第6卷第4号,第374页;收入《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第48页。
- ③ 胡适:《尝试集·自序》第39页,见《尝试集(附去国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
- ④ 王佐良:《英国文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59页。
- ⑤ 艾弗·埃文斯:《英国文学简史》,蔡文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10页。
- ⑥ 梁实秋:《英国文学史》第三卷,台北:协志工业丛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第1585-1586页。
- ⑦ 胡适:《尝试集·自序》第27页,又收于《去国集》第50页,见《尝试集(附去国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
- ⑧⑩ 徐志摩:《莪默的一首诗》,《徐志摩全集》,赵遐秋、曾庆瑞、潘百生编,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四卷,第241页。
- 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 ⑲ 闻一多:《莪默伽亚谟之绝句》,原载《创造季刊》第2卷第1号,1923年5月1日出版,“评论”之第14页;收入《闻一多全集》第2卷,孙党伯、袁寥正主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9页。
- ⑳ 天心:《我也来凑个趣儿》,《晨报副刊》,1924年11月12日,第四版。
- ㉑ 胡适在题记中说此诗译自菲兹杰拉德英译本的第108首,可知是译自英译本第2版,因为只有第2版收录了110首四行诗,其他的版本只收75首第1版或101首第3、4、5版。不过胡适此处所附的英文翻译与菲兹杰拉德第2版的文字略有出入,如所引第一行中的第8词“Him”,在菲兹杰拉德的第2版中为“Fate”,菲氏是在第3版以后才改用“Him”一词的。有兴趣的读者可对比:Rubá iyá t of Omar Khayyám, rendered into English verse by Edward Fitzgerald,

the four editions with the original prefaces and notes, Leipzig: Bernhard Tauchnitz, 1910, p102, no. CVIII (second edition); p159, no. XCIX (third edition); p217 no. XCIX.

- ㉒ 欧亨利著:《戒酒》,《新月》,适之译,第1卷第7号,1928年9月10日发行,第9页。这两首鲁拜收录于《尝试后集》,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九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26页。小说男女主人公都对《鲁拜集》情有独钟,经常一起念诵其中的诗句。小说篇名今译《苏格兰威士忌的〈鲁拜集〉》,收录于《剪亮的灯盏》,参见欧·亨利著:《欧·亨利小说全集》,王永年译,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205-217页。
- ㉓ 承朱玉麒教授惠赐其在手稿展上专门拍摄的照片,谨此致谢。
- ㉔ “再团再炼再调和”似是化自那首著名的《我侬词》,“有赵松雪合管夫人‘塑泥人’的小词的意味”荷东:《译莪默的一首诗》,《晨报副刊》,1924年11月13日,第四版。
- ㉕⑲ 郭沫若:《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创造季刊》,1923年,第一卷第三期,“杂录”第1-41页。
- ㉖ 徐志摩:《莪默的一首诗》,1924年11月7日,《晨报副刊》。收入《徐志摩全集》,第四卷,第241页。
- ㉗⑳ 天心:《我也来凑个趣儿》,《晨报副刊》,1924年11月12日,第四版。
- ㉘㉙ 荷东:《译莪默的一首诗》,《晨报副刊》,1924年11月13日,第四版。收入《徐志摩全集》,第四卷,第242-243页,所录诗句略有出入,如“与运神”录作“兴运神”,“参造化”录作“感造化”,“一一”录作“一二”。
- ㉚ ⑳ 《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三期,“杂录”第40页。
- ㉛ 徐志摩:《莪默的一首诗》,1924年11月7日《晨报副刊》,收入《集外译诗集》,见《徐志摩全集》,卷一,第521页;卷四,第242页。
- ㉜ ⑳ 《希望》一诗可以说是译成汉语次数最多的英语诗歌之一,据说先后共有26个出自不同译者的版本。参见邵斌:《诗歌创意翻译研究——以〈鲁拜集〉翻译为个案》,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5-157页。
- ㉝㉞ 莪默伽亚谟:《鲁拜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01页。郭沫若的不同版本之间也有些微差异,如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版中,第三行的“不会把”改为“不把”,第四行则删去了“我们”二字(第74页)。
- ㉟ 郭沫若:《沸羹集·序我的诗》,见《郭沫若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文学编,第19卷,第408页。
- ㊱ 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沫若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1卷,第143页。
- ㊲ 郭沫若:《黄河与扬子江对话》,原载1923年1月1日上海《孤军》杂志第一卷第4、5期合刊,“打倒军阀”专号,收入《郭沫若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文学编,第一卷,第314页。
- ㊳ 谢天振、查明建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91页。
- ㊴ 参见邵斌:《诗歌创意翻译研究——以〈鲁拜集〉翻译为

- 个案》，第84-85页。
- ③⑨ 海亚姆著：《鲁拜集新译》，覃学岚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1年；滕学钦译：《陌上蔷薇：鲁拜集新译》，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1年。
- ④⑩ Omar Khayyam: Omar Khayyam's Quatrains English-French-Chinese Arabic Persian edition, Tehran: Ketabsaray-e Tandis 2002(穆宏燕汉译)。
- ④⑪ Omar Khayyam: Rubaiyat (Quatrains), Persian-English-French-Russian-Arabic-Spanish-Chinese-Japanese edition, Tehran: Gooya House of Culture and Art, 2010(王一丹汉译)。
- ④⑫ 诗人译者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湘。他的《番石榴集》大概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部世界范围内的译诗选本，入选其中的波斯古典诗人有5人，除了阿玛·加漾（即欧玛尔·海亚姆）以外，还有左若亚斯忒（琐罗亚斯德）、茹密（鲁米）、萨第（萨迪）和哈菲士（哈菲兹）。参见朱湘选译：《番石榴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5-31页（15首）；又见《朱湘译诗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17页。此外，《番石榴集》下卷（第237-313页）收录安诺德（M. Arnold, 1822-1888）的长诗《索赫拉与鲁斯通》实际上也是波斯古典文学故事，出自波斯诗人菲尔多西（940-1020）的史诗《列王纪》，索赫拉（今译苏赫拉布）与鲁斯通（今译鲁斯塔姆）的故事是这部波斯民族史诗中最著名的一个悲剧。
- ④⑬⑭ 张承志语，见《波斯的礼物》，《文明的入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23页。
- ④⑮ 金庸：《倚天屠龙记》，香港：明河社，1983年（第5版），第3册，第1199页，第30章《东西永隔如参商》。
- ④⑯ 这方面的著述极为丰富，笔者所见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莫渝著《〈鲁拜集〉——甲子翻译史》，《台湾时报》，1987年3月6日；黄果炘著《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英语诗汉译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邵斌著：《诗歌创意翻译研究——以鲁拜集翻译为个案》，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3-157页（《鲁拜集》百年汉译研究）。
- ④⑰ 黄果炘：《英诗汉译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80页；黄果炘：《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英语诗汉译研究》，第227页。
- ④⑱ 邵斌：《诗歌创意翻译研究——以鲁拜集翻译为个案》，第178-185页。
- ④⑲ 姑丽娜尔·吾甫力：《译者的误读与误导——以欧玛尔·海亚姆诗歌的翻译为例》，《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3期。
- ④⑳ 沈一鸣：《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在世界文学中的运用——以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翻译为例》，见《东方文学研究：文本解读与跨文化比较》，王邦维主编：《东方文学研究集刊》第6辑，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1年。
- ㉑ 王佐良：《论新开端》“序言”，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年，第1页。

## Journey of Poetry across Cultur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 ——Epochal Opportunity for Earlier Successful Chinese Version of Literature from Rubaiyat

WANG Yi-da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Rubaiyat is a masterpiece written by Mr. Omar Hyam, a Persian poet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y, which became famous in the world for English version made by Edward Fitzgerald, a British schola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popular in China through Hu Shi and Guo Moruo'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the past 90 years or more, Rubaiyat in Chinese versions have come out in succession, so have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poetry translation, thus becoming a unique eye-catching phenomen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 essay starts with the earlier translation of Rubaiyat made by Hu Shi and Guo Moruo, discusses the epoch factors for their translation success and argues the demand that accords with era and translations that conform to epoch spirit has vitality to cause strong echo among readership.

**Key Words:** Rubaiyat; Persian Poetry; Chinese Translation; Omar Hyam

[责任编辑 杨帆]



王一丹，北京大学波斯文学硕士（1990），德黑兰大学波斯文学博士（1998），现为北京大学波斯语教授。研究专长为波斯古典文学、波斯语历史文献学、13-14 世纪中国与伊朗文化交流，主要著作有《波斯拉施特〈史集·中国史〉研究与文本翻译》（2006）、《拉施特〈史集·中国史〉校注》（2000，波斯文），译著《玛斯纳维全集》第四卷（2002，合译）、《鲁拜集》（2010）以及论文《波斯、和田与中国的麝香》等多篇。

（文章内容详见第 1—7 页）



赵华胜，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新疆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中俄关系、中国与中亚关系、上海合作组织等领域的研究。主要著作有：Central Asia: Views from Washington, Moscow and Beijing. M. E. Sharpe, INC. New York. April. 2007.（与 Eugene Rumer, Dmitri Trening 合著），《中国的中亚外交》（2008），《上海合作组织：评析和展望》（2012 年）等。

（文章内容详见第 15—24 页）



默罕默德·巴格勒·乌苏吉，伊朗德黑兰大学历史系教授，2011 年 9 月至 2012 年 6 月任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访问学者。主要从事蒙古史（伊利汗国与帖木儿汗国时期）、波斯湾及海路交通史研究。出版论著及编著 24 部，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

（文章内容详见第 8—14 页）



崔光莲，博士生导师，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担任新疆财经大学校长及自治区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成员等多项社会兼职。近年来，主持完成国家级、自治区级课题 10 余项，发表权威核心期刊论文、专著 10 余篇（部）。荣获国家级、自治区级各类学术奖项 12 项。

（文章内容详见第 25—31 页）



温玉成，1964 年毕业于北大考古专业，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员，担任多所大学兼职教授。研究佛教考古、佛教史及民族考古多年，出版专著《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中国佛教与考古》、《少林访古》等 10 余部，发表论文《禅宗北宗初探》等 170 多篇。

（文章内容详见第 39—44 页）